

(上接第一版)

1957年,他当上全国劳模,在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。上级准备破格提拔他当新乡专区农业局长,他谢绝后留在刘庄。

1965年,新乡地委下达任命,他进城当了新乡县委副书记,还兼任刘庄大队支书(注:1958年-1983年人民公社时期,刘庄村为刘庄生产大队)。不久“文革”动乱,他被打成“黑劳模”、“走资派”游街挨斗。1968年9月一个深夜,他带上行李骑自行车回了刘庄。

1977年,他再次当选全国劳模,河南省委任命他为新乡地委书记。地委第一、第二书记登门做工作,他要求兼任刘庄大队支书。上任后,平时在刘庄办公。直至转任新乡市人大副主任,他还在刘庄……

一生一世,史来贺都不肯离开刘庄。客观原因是刘庄群众不愿他走,他自己又为了什么?

他说:1949年8月6日,我在刘庄第一批入党,是在镰刀锤头的党旗下立过誓的,当时没见到统一的誓词,我掏心窝子说过:“为了刘庄父老乡亲有饭吃,有衣穿,有房住,都过上好日子,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,不怕死,不怕苦,不怕吃亏,跟党走一辈子不变心,死不回头。”共产党员一诺千金,我怎么一走了之?

他说:1957年,周恩来总理得知刘庄千亩棉田亩产皮棉111斤,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,握着我的手说过:“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,给全国树立个榜样。”如果哪天又见周总理,总理问我:史来贺,你的棉花种得怎么样了?我该怎么回答?

他说:我和同时期的全国劳模文香兰谈过,咱农业劳模的责任,就是跟群众一起劳动,把脚下这块地球修好。我知道自己的能力,只适合干村文书……

记者采访时,一位退休村干部又作了补充:

因为,老史忠于共产党的理想,把自己完全放在老百姓中间;

因为,老史他是穷人出身,有穷人的体会,始终没把穷人忘了,没把可怜人忘了。

那年看电视剧《巍巍昆仑》,看到剧中的毛主席蘸墨挥毫,一笔写下“永远站在劳苦大众一边”,史来贺忽腾一下站起来,热泪盈眶迸出一句:“毛主席啊,最了解中国国情,最了解农民!”

他一辈子情有独钟,正是最广大的劳苦大众。他之所以对共产党忠诚,是因为共产党对老百姓好,为劳苦大众谋幸福;他之所以为劳苦大众献身,是为了老百姓相信共产党,跟共产党走。就是这样一种逻辑组合、一种血肉组合,使他的政治志向至大、至纯、至坚、至刚。

他的人民观,与生俱来,是由苦大仇深的出身决定的。

1930年7月25日,史来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家。他从小满眼都是苦难,父亲给地主扛了30年长工,加上连年涝旱盐碱灾害,家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。土匪抢劫留下黑条限期交钱,全家哭天不应,把口粮、被子、棉袄都卖了,那个饥寒年关就像《白毛女》中杨白劳家的场景。他4岁时生对口疮,12岁时发高烧,无钱医治两次差点夭亡。尤其1942年河南大灾荒,刘庄死了60多口人,16家绝户,史家也失去3位亲人。从小最亲他的堂哥快饿死了,他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给堂哥吃,眼睁睁看着堂哥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他的妻子刘树珍,父亲被日本人抓劳工砸死在煤窑里,全家外出逃荒前,把16岁的她送到史家成亲,那年史来贺才14岁,过早地长成了男子汉。他给富人打长工、放牛羊,又到小冀镇赶集做小生意,爷奶奶儿喊着他叫卖蔬果茶水;冬天拉粮车当脚力,脚跟冻裂在雪地留下一路血迹……

所以,他的初衷充满痛感,他的追求带着血痕,怀着一种强烈的抗争心理,为贫穷农民翻身,为劳苦大众谋利益,他成了旧社会苦难的彻底颠覆者。

刘庄,坐落于一个历史的敏感地带。知中原而知天下,这片土地成了一块当代“试验田”。1958年,毛主席到与刘庄相邻的七里营视察,提出著名口号“人民公社好”;1957年,周总理希望刘庄给全国树立榜样;1981年开始,党中央又持续关注刘庄改革进程,逐年汇报逐年批示……只有一千多口人的刘庄,成了中国农村发展大棋盘上一枚具有代表性的棋子,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密集地莅临刘庄,10多个国家的政要和专家频繁地访问刘庄,全国参观者涌向刘庄,国内外媒体报道刘庄……

为什么是刘庄?——因为有史来贺。他为世人始知,就是一个农民带头人,他一辈子珍重这个身份,一辈子尊崇这份价值。为了探

中 国 村 魂

20多年前就为集体新村统一安装了空调,外村亲戚都来刘庄避暑。开干部会时,他指着空荡荡的村街说:“你们看,群众这会儿都在家凉快哩,该睡的睡了,该上班的上班了,多美啊!”

冬天,一下雪,他就抱着对讲机,通知农场场长让职工晚上下班,通知车间主任提醒青年工人穿棉袄。又从大喇叭里通知新单元楼住户:村干部马上去送煤和火炉了,保证每家不受冻!

过年,他和村干部照老规矩,到牛屋马厩过除夕,替饲养员喂牲口,让他们回家吃团圆饺子……

一桩桩,一件件,老史重重复复50年,人们有多少震撼也平淡了,村民有多少感动也习惯了。老人们喊着他的名字依靠他,其实他也是老人了;病人们拉着他的手指望他,其实他也是病人了。他常常掏出口袋里的救心丸送给需要的人,自己却病到大小便都行动困难了还不让人服侍……

然而,他平时说得最多的却是:“咱刘庄的老百姓真好!”

当他是风浪中一条蛟龙,群众是海;当他是困难面前一只猛虎,群众是山。当他遭受委屈、冷遇、挫折,不太懂政治的农民心里也有杆公平秤。

他最难忘“四清”运动中那一幕——打麦场上,黑压压坐了几百人,一个由中央、中南局、省委、地委30多名干部组成的“四清”工作组,带着“越是红旗单位问题越多”的成见,踢开刘庄大队党支部,召开批斗会。已经“靠边站”的史来贺,在会上接受“四清”积极分子的揭发批判。一个外号“抵人生”的社员,以前损公利己挨过老史的批评,上台大呼小叫,越说越激动,突然甩掉棉袄,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扑向老史。几百名社员忽地一下全站起来了,“抵人生”的拳头挥向老史时,人群挡在了老史面前,瞬间站成一道人墙,顿时震惊了工作组!老史低头站久了坚持不住时,一个凳子悄悄递过来,向来少言寡语的普通社员刘名勋,轻声说:“老史你坐这儿吧。”……这道人墙,这个凳子,让老史感动至死。

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人民群众的力量,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已经漠然置之。他们身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,却已失去与民共处的愿望和热情,失去与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。宗旨誓词,只讲不做,在百姓面前轻民、鄙民、欺民、惧民,以及群众之间隔膜、棚架、鸿沟、壁垒,以致出现官向官、民向民的对立。正如刘庄村民说的:“对党对人民,那些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官员,咋不官僚?咋不腐败?必然!”膨胀时可怕,空虚时可怜,像一个气球一触就破,不过区区半张皮。总之,对于党员干部来说,群众在你心里有多重,你在群众心里就有多重;你心里没群众,群众心里也没你——于无声处,雷霆万钧。

所以,史来贺一生不唯官,不唯上,唯对群众有“两怕”。

一怕,怕在群众中孤立。

初中毕业生张秀贞1960年嫁到刘庄时,就像《朝阳沟》的“银环”。头次参加群众大会,她想,史劳模一定很魁梧,呢子大衣、呢子帽、大皮鞋……台上站起一个人,头系白羊肚巾,黑袄黑裤黑布鞋,嗨,就是个庄稼人嘛!

老史与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云邦聊天:“新中国成立前,端着饭碗上街里的饭摊儿,咱们碗里是胡萝卜丝、白萝卜丝、白菜心,地主的小面里,搁几片牛肉,香油一拌,明晃晃的,咱们看着啥滋味?现在咱们当干部了,啥时候都不能特殊,一些贫困百姓,也是眼巴巴看着的呀。”

他与家人约法三章:一不比群众特殊,二不占集体便宜,三不收礼送礼。几十年老伴没乘过他的车,5个孩子也要“夹着尾巴做人”。

他任新乡地委书记期间,专车和秘书可以带回刘庄,他说不需要。在新乡市一间房子也没住。

他直到逝世前去住院时,还催促村干部:“我想来想去,全村可能数老王家日子最差,你去看一看他有啥困难没有。”腿有残疾的王伟民,早年从安徽逃荒落户刘庄。村干部看了回来说,老王家小院可干净了,床上新被子,老伴也体贴,他还亲口说有几万元存款。老史长舒一口气:“只要他还能存几万块钱,村里所有人的生活就不成问题,这我就放心了……”

他训起人来快人快语,记性又好,一抖落一串儿,当众夸得叫你地缝难钻。但这只对干部不对村民,他怕伤着群众:“你罚他,罚苦了还得帮他过日子,村上能得多少利?”即使批斗过他、诬告过他的人,他也宽容相待,甚至委以重担。

晚年的史来贺,更审慎,更明达。吸取一些农村典型蜕化变质的

教训,防止个人威望形成“一言堂”,因而特别注重民主,村里大事都交群众大会讨论。

对接班人问题,他的态度更鲜明:刘庄产生干部,不能个人指定,要集体培养、大家选举,谁能让群众生活富裕,谁能让集体经济壮大,就选举谁。在他去世20天后,刘庄全体党员大会上,不提候选人,直选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。史世领以全票当选,但因父亲过去不许出头露面,他对上面七里营镇的干部都认不全。

二怕,怕在群众中孤独。

“四清”运动最后宣布刘庄为“四清队”,群众大会欢送了工作组,但在运动初期,老史是被逐出大队办公室的,也禁止与群众接触,连常去他家借桶挑水的邻居都不敢上门了。下田劳动,没人敢走近他,上工下工一个人,歇息时孤零零地抽闷烟,他落泪了。他感叹:“啥最难受,离开群众最难受。”

他喜欢跟群众一起劳动,汗水相映,肝胆相照,魂魄相依。

他喜欢端着饭碗赶村街上的饭摊儿,跟群众蹲在一起边吃边聊。

直到去世前,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,是在傍晚的下班路上。随处可见个马路牙子,脱了布鞋往屁股下面一垫坐下,男女老少过来,说说笑笑一片融洽。村民们说,老史见过恁多大官儿,还平易近人,见了男娃喊小名,见了闺女喊姐,全村1600多口人,他至少能叫出1000个名字,问间老人,逗逗孩子,夕阳下,晚霞里,那是他笑容最灿烂的一刻……他是为刘庄人民而活的,这是他的一种生存意志,一种生意意义。

史来贺是一本大书,章节各有精彩,但通篇回荡一首主旋律:老百姓是地,老百姓是天,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。

老百姓是山,老百姓是海,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。

风骨

不跟风,有主见,实事求是,与时俱进

改革之初,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来临,七里营诞生的口号“人民公社好”谢幕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,广大农民分田到户“大包干”的欢呼声中,无数目光盯着刘庄,盯着史来贺。

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地来,分明是在敦促、劝告、担忧。按照当时思维定式,谁不分地就是对抗中央,一时谣言四起:“史来贺挨批评了”,“史来贺调出刘庄了”……老史的手不时按在左胸,正是心肌梗塞最忌复发的关口。

刘庄又成一座“孤岛”——分?还是不分?

打顺风旗易,迎顶风旗难,他被推到风口浪尖已不是第一次了。

1956年,刮起“小社并大社”之风,区里将8个村30多个初级社合并为夏庄高级社,提名他当社长。他却弃小求大,坚持刘庄“一村一社”。刘庄高级社与夏庄高级社同日举行成立大会,但区里拒不承认“黑社”,不准参加会议,不予传达文件。这时又遭寒灾,涝灾、虫灾,粮棉收成锐减大半,村里有人要去逃荒了。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,带领群众大种白菜蔓菁胡萝卜,又成立铁木小组、豆腐坊,组织烧砖瓦,到黄河滩割草,到火车站装卸,串乡做小买卖,当年副业收入1.7万元,可买近20万斤口粮,还给群众4次分红。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:中国农村情况复杂,从目前来看,一村一社比较好。勉强凑集的夏庄高级社一年就解体,刘庄保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。

1961年,农村推行“三级所有,队为基础”,从生产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。周围村庄扩大自留地,分养牲畜,调动了生产积极性。老史却弃小求大,坚持以大队为基础。他向在七里营公社蹲点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:“刘庄干部有个习惯,无论啥事,都爱用‘刘庄实际’这把尺子量量。”刘庄就这么大,居住集中,大队有凝聚力,为了利于发展生产,不必人为拆分几个核算单位,还是不退为好。上级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后,把刘庄作为“不退”典型上报中央,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。

“文革”狂飙突起,连郑州、焦作、新乡的红卫兵都到刘庄“点火”,村里造反派贴老史的大字报,因他在全国民兵英会上获得中央军委奖励的一支半自动步枪,还诬他“藏黑枪”。老史力挽狂澜,在群众大会上宣布:“刘庄绝不能乱,今后写大字报的,自己买纸买笔;外出串联的,生产队不记工分、不给盘缠。”正批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时,他被革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,刘庄却于此时拉开了集体企业的序幕。

1976年初,周总理逝世,在“四人帮”的政治高压之下,老史召集村里

干部和党员、团员,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。他说“遇事要有主心骨,不能听风就是雨,咱们还是一心搞发展。”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。

十年浩劫过后,世道人心处处废墟,刘庄却抖落尘埃,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独特景观……

然而这一次“大包干”,非比以往,非同寻常。天大的压力之下,是最艰难的一次抉择,最严峻的一场考验。

生龙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。新乡成立前夕,战事正紧,18岁的他担任刘庄民兵队长,为豫北战役中的解放军抬担架、送粮草,追剿化装逃窜的新乡大土匪卫老启;担任夏庄乡民兵联防队长后,智擒藏身芦苇荡的伪副区长恶霸刘荣堂。到了建设时期,他又是刘庄第一个互助组长、第一个合作社长、第一个高级社长,担任村文书后更是意气风发……

现在,他沉默了。

灯下,一个农民在一间村舍沉思。多少风险多少重荷,多少精髓多少真谛,史来贺深沉稳健的一面,尽在夜色里,尽在不言中。长期失眠的他,一次吃4片安眠药都不顶用。村民们说,一年365夜,俺们全村都睡了,只有老史成夜不睡,为俺们操心。连小孩子都记得村子东北角那一夜夜独明的灯窗——这一幅“静夜思”,是史来贺人生中经典的画面,是刘庄进程中最关键的图示。觉悟悟透,田野生“觉”,村舍里“悟”。坐乡下而观天下,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,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洞幽烛微。他深知,刘庄这面红旗,不进则退,退则必倒,因此他的所有参悟,都是为了与时俱进,使刘庄始终在全国前列。

此时的刘庄,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、水利化,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,工林牧副占总收入70%,2/3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、三产业,集体实力雄厚,机械化程度高,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较强,村民收入稳步增长,实现了阔步前进的势头——刘庄分分不少?

全村300多户出现3种声音,“不分”占75%、“两可”占20%、“分”占5%。想分的人,有的认为凭本事单干会过得更好,有的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夜变成万元户。

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,老史从台上站起来,竟然把中共中央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中整整一大段话,烂熟于心的200多字,一口气背了出来……既然红头文件都说了,“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发,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、多种劳动组织、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”,“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,搞一刀切”,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“不分”更占上风。但老史不搞“少数服从多数”,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访摸底做工作。最终,除了2户决意出去单干,刘庄上形成共识——不分。

刘庄历史上,每一次特立独行,都是一次强刺激,都激发出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。干部群众憋着一股劲,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的优越性。1980年,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“小康村”。

1981年8月,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刘庄,对史来贺说:单靠抓农业,100年也富不起来。你找到了一种好形式。你们先进单位就要先走一步。

1982年,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,分为农业、园林、畜牧、工副、商业、农机、建筑7个专业36个承包单位,实行综合经营、专业生产、分工协作、奖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。2个单干户后来又回到了集体。

21年后,史来贺去世,捧出了2002年那最后一本账:355户1616人的刘庄,固定资产近10亿元,总产值8.8亿元,上交税金4500万元,人均实际分配1万元,户均存款20万元。村民享受20多项公共福利,上学、看病、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,并在兴建别墅新村。农业实现机械化、水利化,粮食亩产稳居千斤以上。除19名劳力在农场经营1050亩耕地,其余劳力从事二、三产业。全村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、农业现代化、经济市场化、农民知识化、生活城市化。

而且,刘庄“一村帮带13村”,把周边新乡县、修武县、原阳县13个贫困线以下的村庄,也带入其中等水平甚至进行行列。

1991年,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刘庄,感慨道:说句心里话,社会主义好,刘庄是有说服力的。

1989年,全国政协主席李铁映视察刘庄,激动地说:我今年80岁了,就是要到农村去。刘庄饿死一个大人!

1990年,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刘庄,题词:发展集体经济,走共同富裕道路。

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:刘庄“堪称依靠集体、全面发展、共同富裕的典型”……

“不倒翁”,“擦边球”——也有人会这样讲。从这种比喻里,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“术”,是技巧;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“道”,是信仰。

实事求是,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。刘庄道路的长期探索中,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深,不论顺风逆水,不论激流险滩,始终处理好“三个关系”: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,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,有主心骨与不断创新的关系……在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,老党员们含泪相问:“50年了,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呢?对照对照,他做的都符合人民的利益啊!”